



十大政府范式

The Ten Paradigms of Government

现实逻辑与理论解读

刘祖云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类项目



十大政府范式

The Ten Paradigms of Government

现实逻辑与理论解读

刘祖云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大政府范式：现实逻辑与理论解读/刘祖云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8
ISBN 978-7-214-11430-3
I. ①十… II. ①刘… III. ①国家行政机关—行政管理—研究—中国 IV. ①D63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3274 号

书 名 十大政府范式——现实逻辑与理论解读

著 者	刘祖云
责 任 编 辑	鲁从阳
装 帧 设 计	许文菲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0 插页 1
字 数	269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11430-3
定 价	3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中国行政改革的核心价值追求:服务型政府 12

第一节 中国“服务型政府”研究:回眸与反思 12

第二节 服务型政府建设:“主体间”互动的分析视角 29

第三节 服务型政府与政治文明的“范式”链接 46

第二章 中国行政改革的两个契入点:责任政府与法治政府 61

第一节 责任政府:从理论走向现实 61

一、“责任政府”及其实现:理论反思层面 61

二、责任政府落定:行政问责从学术、立法到机制的逻辑 82

第二节 法治政府:德性内涵的三重解析 99

第三章 中国行政改革的三个完善路径:有限政府、公共政府与透明政府 118

第一节 有限政府:从内涵到实现路径 118

一、有限政府的内涵:质、量、度的三重解析 118

二、有限政府实现:行政权控制的三个理路 131

第二节 公共政府:“二源”基础、异化及其回归 147

第三节 透明政府:一个政府范式变革的逻辑 164

第四章 中国行政改革的三个操作路径:学习型政府、电子政府与
节约型政府 182

第一节 学习型政府:从三种能力到三重境界 182

一、政府学习的三种能力 182

二、政府学习的三重境界 201

第二节 电子政府:文献研究与理论展望 217

一、1998 年至今:中国的“电子政府” 217

二、虚拟政府:电子政府的一个理论视角 238

第三节 节约型政府:境遇、用度与路径的剖析 255

第五章 生态型政府:中国行政改革全新的政府理念 271

第一节 生态型政府:现实性、学术性与价值性 271

第二节 生态型政府:形式与内容的三重统合 282

第三节 行政学理论“生态学”的积极转向 300

后记 315

导 言

一、“范式”与“政府范式”

1. 从库恩“范式”到“政府范式”

“范式”一词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广泛使用的概念,在库恩那里,它是一个内涵不断变化的概念。尽管“范式”概念在学术界引起了许多歧义和纷争,但库恩在这种千头万绪中却表达了一种非常深刻的见解,即把“范式”看作是介于科学共同体和外部自然界之间有一定层次、结构和功能的独立系统。作为一个系统,“范式”可以在不同层次上归结为三种类型:(1)观念范式:一套根据特有的价值观念和标准所形成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形而上的信念。(2)规则范式:在观念范式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套概念、定律、定理、规则、学习方法、仪器设备的使用规则和程序等规则系统。(3)操作范式:一些公认的或具体的科学成就、经典著作、工具仪器、已解决的难题以及未解决但已明确了解决途径的问题。这三种类型的范式间不是平行孤立的,它们相互作用并形成一定的、有层次的系统。^①

^① 参见孙启贵《库恩“范式”的文化涵义》,载《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库恩在为《科学革命的结构》写的“后记——1969”结尾中,这样说:“一些人赞赏本书,主要并不是因为它阐明了科学的本性,而是因为他们发觉本书的主要论点可以应用于许多其他的领域。”尽管,库恩对其他领域借用他的“范式”还有些怀疑,但是理论研究的实践表明,“范式”概念已被引进了很多领域。正如有学者所言,范式概念具有这样的“潜能”,它能够被我们将其从特定的科学领域的特指性的“科学范式”提升抽象出来,把它作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认识范畴,以此来观照作为整体人类活动的某一特定领域的活动本身的样态。^①对此,行政学或行政管理学等理论领域也引进了这一理论模型,用来概括不同历史阶段公共行政或政府管理的走向与特征。因此,政府范式这一概念就产生了。

“范式”这一概念在国内政治学或行政学领域出现的最早文献是:陈振明教授于1999年在《政治学研究》第1期撰写的论文《从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范式”变化》。在今天的期刊网上,如果以“政府范式”作为关键词,能检索到的文献也不过40篇。但是,根据笔者的研究视野及其体会,“政府范式”已经成为我国行政管理学界一个耳熟能详的理论框架与分析思路,因此可以说,“政府范式”作为政府理论的一个部分,在国内的学术研究还基本上处于一种自发而不自觉的状态。因此,让政府范式理论走向一种学术自觉是必要的。

2. “政府范式”概念的理论内涵

第一,“政府范式”是对政府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关系模式的认识。在库恩那里,“范式”作为一种理论,它表达的是对“科学共同体”与“外部自然界”之间一种特定的关系模式的理解与认识。因此,从指向上看,“范式”的母体是“科学共同体”,或者说“科学共同体”与“范式”是一个共生性的概念。也就是说,某一特定范式是一定的科学共同体特有的,或者说,一个科学共同体的存在就是因为共有了只属于它们的特定

^① 朱爱军:《论库恩的范式概念及其应用》,《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5期。

范式。^①因此,“政府范式”要表达的就是对“政府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一种特定的关系模式的理解;同样,政府范式的母体就是政府共同体。比如,“管制行政”与“服务行政”就是两种不同的政府范式,“管制行政”所要表达的是以政府为本位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模式,而“服务行政”所要表达的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模式。无论是“管制行政”还是“服务行政”,其母体都是政府共同体,也就是说,某一政府共同体拥有什么样的行政范式,它就会依据这一范式去处理它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第二,特定的“政府范式”表明了某一政府共同体的行政价值观与行政态度。库恩说:“范式一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科学家由一个新范式指引,去采用新工具,注意新领域。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在革命过程中科学家用熟悉的工具去注意以前注意过的地方时,他们会看到新的不同的东西。范式的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只要他们与那个世界的沟通是透过他们所看的和所干的,我们就可以说:在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②在这里,库恩表达了两方面的意思:其一,特定的范式代表着某一共同体特定的价值观;其二,而特定的价值观又表明这一共同体的“眼光”。同样,政府范式也是如此。比如“权力行政”就代表着政府与官员以一种管制的行政价值来看待社会共同体,在政府行为中,政府与官员看到的只是权力的作用;而“责任行政”却代表着政府与官员以一种负责任的行政价值来看待社会共同体,在政府行为中,政府与官员看到的更多是责任。

第三,源于社会的发展,“政府范式”需要革命性的转换。这就是国内行政学界经常提到的“范式转换”的含义。库恩认为,“如果形势需要新理论,以解决因旧理论与自然间不相应而出现的反常,那么一个成功的新理论必然做出某些与旧理论不同的预言。”^③因此,不论我们在哪个

① 朱爱军:《论库恩的范式概念及其应用》,《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5期。

②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③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89—90页。

领域使用“范式”这一概念,都必须与“范式转换”联系起来,都必须将新范式取代旧范式作为这一领域发展的关节点,尤其是政府范式。因为,从学理上看,政府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的关系是动态的、发展的,政府需要根据社会的变化与发展来调整自己的行政价值观,而不是相反。因此,政府范式不断地进行革命性的转换,这既是政府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政府对于自身存在价值的自我求证。而政府范式转换必然在观念、规则与操作等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其中最核心的乃是观念层面的转换。比如像服务型政府、生态型政府等的实现,就需要政府共同体构建比较前沿的行政价值观念,从而与社会共同体进行有效的互动。

第四,“政府范式”本身具有两种样态。范式可分为两种样态,一种为理论研究范式,另一种为实践行为范式。理论研究层面的政府范式,它的提出与确立是通过逻辑推演、理论论证来建构与实现的,它的主体是学术研究者,它是以话语形式,尤其是理论的逻辑性表述来存在的。而实践行为层面的范式,它是指实际支配政府共同体的行政价值、行政规则与行政操作性工具,它是以政府共同体所有成员的体验与践行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理论性的政府范式与实践性的政府范式之间就类似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两者的基本关系乃是双向建构、互相渗透、互为中介的关系。首先,理论性的政府范式是对于实然的行政实践发展趋势的“预言”与“提炼”,它常常具有前端性与预见性;它一开始在学术研究者的文本中以逻辑语言的形式存在着,并在理论论证中获得了建构。然后,理论性的政府范式会以理论形态的方式作用于政府共同体,并对政府共同体的行为进行引导,当政府共同体认可这种范式时,它就实际变成了实践层面的政府范式,而发挥着行政价值观与行政态度的作用。

二、“十大政府范式”研究的缘起

为什么要研究“十大政府范式”?笔者认为,一方面,自上世纪40至6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了对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批判与新公共行政学的兴

起,以及上世纪 70 年代的公共管理学的兴起,这两次理论革新直接导致了两次政府改革运动,即“新公共行政运动”与“公共管理运动”。无论是着眼于理论变革还是政府改革,这两次运动都标志着西方政府范式的革命性变革。因此,西方国家政府范式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变革,是中国学者行政学理论研究的支援性背景。另一方面,自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在改革开放的宏大社会背景下,中国政府屡次进行行政改革。这些改革行为本质上是在突破旧有的政府范式,以图建立新的政府范式。中国政府的改革是中国行政学理论研究思路展开的重要触发元素。因此,对于中国政府的改革行为,行政学界做出理论上的应对,把政府范式的理论提出来是必要的。

1. 支援性背景:西方国家“政府范式”的变革

第一,自上世纪 4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政府范式变革具有两重意义,一是理论层面的政府范式变革,它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理论意识样态。在批判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基调上,西方行政学界关于政府范式的理论研究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景象。二是实践层面的政府范式变革,它指的是政府共同体的行为变革。实质上,这种变革,一方面是对社会共同体要求的回应;另一方面,也是对西方政府范式理论的积极呼应。而且,这两个层面的范式变革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互动与相互建构的关系。

第二,从大的方面来看,西方国家政府范式变革的理论内容,主要表现为新公共行政学与公共管理学的两次“范式”转换。一方面,在上世纪 40 年代至 60 年代,西方理论界在对公共行政学传统的批判中,带来了公共行政学理论范式的转换,其结果就是新公共行政学与政策科学(政策分析)的出现。另一方面,自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西方各国的政府管理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在公共部门管理实践与社会科学发展内力这两个因素的推动下,80 年代中后期在美国出现了公共管理运动。这场运动旨在以政府与其他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融合各种学科相关知识与方法,创立一个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的新知识框架,

以适应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①

第三,从小的方面来看,西方国家政府范式的变革,在理论上还提出了许多具体而微的政府范式的理论模型,这些理论模型强烈地牵引着政府组织行为的改革。比如,无缝隙政府、企业家政府、市场式政府、解制型政府、弹性化政府与虚拟政府,等等。这些具体的政府理论模型是政府范式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

2. 触发性因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改革

从学理上讲,政府自身的目标定位只有放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才有意义,因为,对于社会来说,政府只具有工具价值。因此,政府自身的价值定位与发展目标的最终根据就是社会共同体发展的需要。鉴于此,政府改革本质上就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调整政府的行为与发展策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对此,有学者概括为:(1)从传统产品经济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转型。(2)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3)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4)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5)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由此,社会转型使社会生活表现出以下种种特征:利益结构多元化、经济生活市场化、政治生活民主化、公民主体意识明晰化。^②

面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急骤转型,政府必须调整自身的管理理念、行为规则与政策工具。也就是说,政府必须通过自身行为范式的转换,以保持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互动,这样,就展开为政府的行政改革行为,以图政府行政范式的历史性转换。对此,有学者概括为这种行政范式转换的要素有:(1)从管制行政转向服务行政。(2)从全能行政转向有限行政。(3)从依政策行政转向依法行政。(4)从免责行政转向责任行政。^③因此,在中国政府的改革战略中,表现这些改革倾向的具体的行政范式在各个层级

① 参见陈振明《从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范式”变化》,《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1期。

② 肖文涛:《社会转型与政府行政范式转换》,《东南学术》2001年第6期。

③ 肖文涛:《社会转型与政府行政范式转换》,《东南学术》2001年第6期。

的政府文件中获得了肯定,其中,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这三种政府范式是出现频度最高的;有限政府、透明政府、公共政府次之;2000年之后,像节约型政府、电子政府、学习型政府也有一定频度的出现;而近几年,在生态文明的语境下,生态型政府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提及。

可以说,中国政府发展与改革要求的政府范式变革的客观要求,是触发行政学界展开政府范式理论研究的重要元素,而行政学界通过政府范式的理论研究,也密切地与中国政府的改革发生着强烈而持续性的互动。这就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动,也是理论性的政府范式与实践性的政府范式之间的相互建构。在这种互动与相互建构中,一方面,在行政改革实践的牵引下,行政学关于政府范式的理论由浅入深,并带动着相应研究群体的出现,从而推动着中国行政学政府范式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关于政府范式的理论研究,也持续地影响着甚至是引导着中国政府的改革行为,从而发挥着理论的先导与前瞻作用。

三、“十大政府范式”研究的意旨

1. 政府范式理论研究的学术意义

第一,从行政学理论、政府理论、政府范式理论的关系看“政府范式”研究的意义。在行政学理论中,政府理论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在政府理论中,政府范式理论也是其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政府范式理论是以政府组织为研究对象,以探索它在行政观念、行政规则与行政操作性工具等三个方面的发展与变革,并以一个核心概念来表达这种发展与变革走势的一种政府理论。尽管政府范式理论研究在国内还不太成熟,但是国内的行政学界不乏有人不自觉而频繁地使用这一概念。因此,系统而自觉地提出这一理论形态,对于丰富我国的政府理论以及行政学理论,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第二,从政府理论创新的角度看“政府范式”研究的意义。当今中国政府改革的实践需要政府理论创新,否则,中国政府的改革就可能出现

战略性失误。而政府理论创新,一般表现为两种模式:一种是肯定性的累积型模式,另一种是否定性的批判型模式。前者主要是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作出符合时代特点与要求的新的解读,也就是说,对前人的理论根基并没有进行根本性的破坏。而后者则是从观念、规则与工具等三个层面上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革命性的突破,这就进入到库恩所说的理论范式转换的层面了。因此,政府理论创新需要依托于政府范式的理论分析思路,依托于从行政观念、行政规则与行政操作性工具的三个层面上来革新原有的政府理论,或者说,通过政府范式理论,进入到政府理论的“内核”,以拆解原有政府理论中的“韧性”保护带,在吸纳新的社会共同体要求的前提下,从根本上实现政府理论的创新。

第三,具体来说,本书在政府范式的理论研究中,选取了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政府文件中被广泛认可、同时又被行政学界广泛讨论的十种具体的政府范式作为研究对象,按照一定逻辑顺序排列,进入到每一种政府范式的学理层面,进行理论解读与演绎。因此,这一研究可以丰富我国行政学的政府理论,并为我国政府理论创新提供一些新的学术元素。另外,本书独特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哲学与伦理学的规范研究,也可为我国政府理论的创新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2. 政府范式理论研究的实践价值

第一,从宏观的视角看,政府范式的理论研究可以与政府的实践行为形成有效互动,在两者的相互建构中,以理论的力量来规范政府的改革行为与改革策略。笔者认为,这一规范过程的路径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学者们关注与研究政府范式理论,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系统的研究成果,当研究成果达到一定量以后,某些学者就会以专著或研究报告等形式集中发布自己的研究成果,以增加其学术影响力。第二阶段,当学术论文与学术专著达到一定的质与量后,在高等学校的教材中,就会吸纳相关的政府范式的研究成果,到这时,关于政府范式的学术理论就产生了更大的影响面,因为,高校教材在时间与空间的两个维度上扩展了政府范式这一学术成果的影响力。第三阶段,随着政府范式理

论社会影响力的增加,大众媒体与大众舆论会介入对它的宣传,这时,关于政府范式的学术话语就会转变成新闻话语与大众话语。到这时,关于政府范式的学术话语、新闻话语与大众话语就形成了一种社会的合法话语,它具有强烈的规范与训导作用,并对政府共同体的行为产生着引导与规范的作用。根据笔者的研究,本书所提到的十种政府范式,无一不是按照这一逻辑,对我国政府的改革行为以及对政府官员的行政行为起着规约作用的。

第二,从微观上看,本书选取了具体的十大政府范式,通过对每一种政府范式的研究,有的是重新解读它的内涵,有的是提高了它的学术边界,有的是扩展了它的学术含义,有的是延伸了它的学术影响等等,这些学术努力的目的都旨在增加政府范式理论对政府实践行为的规范力量。

四、“十大政府范式”的内在逻辑

本书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出现的十大政府范式进行了哲学的解读与伦理的演绎,这样就构成了本书正文的五章,涉及政府范式的次序是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有限政府、公共政府、透明政府、学习型政府、电子政府、节约型政府、生态型政府。作出这样的编排顺序,是遵循其内在逻辑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有两点:第一,选取这“十大政府范式”已经考虑到这些政府范式在中国政府改革实践与行政学理论研究中的出场顺序。第二,这十大政府范式之间并不具有相互排斥性,从总体上说,它们共同组合成中国政府改革的一个大的理论范式,旨在替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所形成的政府实践范式——即价值上以政府为本位、规则上强调政府管制、操作上政府掌握全部社会资源的“全能政府”。

本书所选取的十大政府范式,从其内在的逻辑结构上看,可以分为五个部分,即本书的五章。

第一,服务型政府处于核心地位。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文件与行政学研究中提及最多也是最常见的政府范式,就它在中国政府改革与行

政学研究中的地位来说,任何一种范式都不能与其相提并论。从库恩的范式理论来看,它是处于观念层面的范式,因此,其他的政府范式最多只是处于规则层面的范式而已,换言之,其他的政府范式实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服务型政府,而不是相反。对此,笔者曾将“服务型政府”称作是行政价值观层面的政府范式。

第二,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价值观范式,需要一些其他的政府范式来保证它的实现,因此,基于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管理的两个最基本的特点——责任缺失与人治模式,“责任政府”与“法治政府”这两个政府范式就应时地提出了。不过,在中国政府的正式文件中,这三个政府范式常常是相提并论的,它们只有前后次序上的差别,而没有重要性的差别。而且,在行政学的学术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也都对此不作区别。但是,笔者认为,责任政府与法治政府是中国实现服务型政府的两个最基本的前提,服务型政府是目的,责任政府与法治政府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是不能混淆的。

第三,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在发生着慢慢的变化。社会共同体不仅要求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有责任并依法行政的政府,而且随着行政学研究视界的开阔,公众对我们的政府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这样,三种政府范式就应运而生了,即有限政府、公共政府与透明政府。“有限政府”是对政府权力与职能有限性的要求,它针对的是全能的政府模式。“公共政府”对政府权力、财政、资源以及服务等方面的公共性提出了要求,它针对的是一个过度关注自身私利即自利的政府。“透明政府”是对政府的政务公开提出的要求,它针对的是一个信息与政务难以向公众公开的封闭性的政府。可以说,有限政府、公共政府、透明政府与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地位是一样的,它们也是实现服务型政府的工具性范式。但是,这三种政府范式的提出,是对政府范式认识的深化与细化。

第四,在新千年前后,随着社会共同体出现了许多新的元素,社会共同体在技术的层面上对政府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这时,就提出了学习型政府、电子政府与节约型政府等三个政府的新范式。“学习型政府”

范式是在彼得·圣吉“学习型组织”新理念的启发下而提出的对政府学习能力的要求;“电子政府”是伴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对政府信息化建设方面提出的新要求;“节约型政府”则是在中国提倡“节约型社会”的境遇下对政府浪费行为提出的批评。因为,这三种政府范式的特点是着眼于政府技术层面的变革要求,所以,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它们是处于操作工具性的政府范式。

第五,生态型政府是本书研究的最后一个政府范式。从出场来看,它也是最近几年才出现在学者的研究视界中的,即是最后出现的。尽管在中国行政学界,关注这一政府范式的学者还很有限,但是在生态文明的语境下以及中国生态破坏与生态危机的困境下,运用生态学理论来思考与建构中国政府的范式理论,应该是一个很有发展空间的学说。正因为如此,这一政府范式理论一提出来,就获得了学术界的肯定与关注,相关学术论文在快速地增长。

总之,服务型政府是处于行政价值观层面的政府范式,它是所有政府范式的核心,它体现着中国政府改革的总体目标与战略方向,在这一点上,任何其他的政府范式的功能与作用都不能与它相比。责任政府、法治政府与有限政府、公共政府、透明政府从两个时段、两个层次上构成了规则层面的政府范式,它们是服务型政府实现的过渡环节,总体上处于政府范式理论的中层结构。学习型政府、电子政府与节约型政府,则处于政府范式理论的外围,属于政府范式的操作层面,也是对政府改革行为的技术性要求。

唯有生态型政府给政府范式的理论研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即把原有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扩展到政府与自然的关系模式上。也就是说,从服务型政府到节约型政府等范式理论,都是在研究政府与社会及其公众的关系问题,在这些理论视角中,是没有自然环境的地位的。而生态型政府试图改变这一理论思路,它面对的是政府与社会、公众以及自然环境的广泛关系。因此,这一范式理论的出现,会在生态管理、生态规则与生态价值等三个层面上,来重新思考与建构政府的范式理论。

第一章 中国行政改革的核心价值追求： 服务型政府

第一节 中国“服务型政府”研究：回眸与反思

（一）回眸：线性、平面与立体的三维展开

自 1995 年始,伴随着中国行政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国服务型政府的理论研究就历史地展开了。本部分的回眸,拟通过这一理论研究的三维展开来呈现我国服务型政府研究者的历史贡献。一般地说,一个新的学科的兴起及其逻辑展开,基本上是按照线性轨迹、平面铺陈与立体构造的三个维度展开的。所谓“线性轨迹”是指,贯穿于这一学科的核心概念的产生、演变,以及伴随着这些概念的变化而形成的理念的变化。“平面铺陈”是指,理论研究在向前推进时,必然以核心概念为轴心向两边展开,这一铺陈既可以丰富对核心概念的理解,同时也增加了许多新的学术增长点。只有这样,核心的学术概念在研究的进程中才有可能从抽象走向具体。“立体构造”是指理论研究的生长,必然在许多方面呈现出立体性的特征,它主要包括: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学术专著的出版与理论走向大众化等趋势。理论研究到了这一程度,它既是丰富的也是具体的。也就是说,它开始以理论的力量来超越现实并建构现实。中国服务型政